

# 论商周时期青铜器作用及饰表意的演变

李 岩

(浙江丽水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 要]** 商周时期因青铜文化显著而又被称之为青铜时代, 根据对这一时期青铜器纹饰和青铜器用途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可以看出商周早期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 纹饰主要表现为对天和神的敬畏; 西周中晚期以礼器为主, 纹饰方面开始表现写实内容; 东周时期的兵器和日用品增多, 纹饰以社会生活的场面为主题。这些发展变化都彰显出商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和利用能力的增强, 体现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 商周; 青铜器; 纹饰

**[中图分类号]**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674(2007)04-0094-03

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历史渊源流长, 商周时期最为兴盛, 被称为青铜时代。本时期青铜器的用途可以分为工具、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在礼器内又可分为饪食器、酒器、水器等几类。但是, 这些种类的青铜器根据整理研究后就会发现, 在商周的不同时期, 它们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同时反映着这一时期社会的发展变化。

对于青铜器的分期, 有时代划分法, 如郭沫若的四时期划分法(即滥觞期、勃古期、开放期、新式期)<sup>[1]</sup>。张光直在讨论动物性纹样时采用了高本汉的分期方法, 即古典式、中周式与准式<sup>[2]</sup>。本文综合考虑不同时期的时代面貌和社会发展, 将商周青铜器纹饰和用途分为商代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和东周三个阶段进行研究, 以期对这些问题所反映的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状况作一初步探询, 请指正。

## 一、商至西周早期

商周早期出土的青铜器以礼器和兵器为主, 在偃师二里头和殷墟等地主要出土有鼎、鬲、爵、斧、斚、钺、簋、鼎, 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 所谓“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比如, 商代的爵, 很多人认为是普通的酒具, 但是结合商代的社会状况, 商王“率民以事神”是国家的重大事务之一, 酒的作用可以使人饮酒后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殷民们认为这样能够与神沟通, 其实, 以商代的生产力还不可能生产出剩余的粮食来满足人们的饮酒需要, 主要目的是为了祭祀, 所以有人看到从商墓中出土大量的酒器, 就认为商人好酒, 其实不然, 张光直先生也认为巫覡“是使用酒精或其他兴奋药剂, 达到昏迷状

况而与神界交往的”。<sup>[3]</sup>另外也有一些生产工具, 不过数量极少, 也不会占据生产的主要地位, 从考古发掘来看, 此时的生产工具应当仍然以石器 and 木器为主。

商、西周早期, 当时人类因自身力量不够强大, 感到周围一切自然之物都对自身生存构成影响, 从而对自然产生一种崇拜感, 认为“万物有灵”, 因而代表自然的动物就被描绘成青铜器上之狰狞、威严、肃穆、神秘而无法把握的神异形象。纹饰上通常装饰有饕餮纹、夔纹、兽首纹、云雷纹、目雷纹、乳钉纹、联珠纹、涡纹、弦纹、三角纹、镂孔等十余种。商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人物亦是以一种神秘怪异形象表现出来的, 他们身体各部分虽还较合比例, 面部五官位置亦较恰当, 但却被添加了兽角、兽耳, 周身满饰神秘花纹, 他们本身已非普通人类, 而应代表“神”和“上帝”的形象。

商至西周早期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 是饕餮纹, 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 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 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 有首无身, 食人未咽, 害及其身”, 故此, 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 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 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典型的青铜器如司母戊方鼎以细密的石纹组成的装饰带衬托浮雕式的兽面纹主题, 整体面貌以对称的狰狞兽而象征王权威严, 是商末青铜器的代表作。在商周文化遗存中十分常见的青铜斧钺也具类似特

**[收稿日期]** 2007-05-06

**[作者简介]** 李岩, (1970-)男, 山东人, 浙江丽水学院讲师,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博士, 研究方向: 古代史。

征。山东益都苏埠屯1号墓出土的兽面纹大钺,器身铸有饕餮纹,两眼突出、牛鼻獠牙,以神灵式的威慑面貌赋予兵器神力并显示帝王的威严。

我们认为,不论饕餮来自于什么动物,它所表达的都是一种形式上的无限大和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给人以高昂、威严和神圣的力量,这些都表现商代至西周前期人们审美意趣服从于宗教迷信的倾向,不是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而是满足宗教信仰的需求,饕餮既是先民将某种自然物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以代表一氏族或民族的祖先加以崇拜,也是人类对各种自然物本身神化的顶礼膜拜。因此饕餮的出现反映了人们一种普遍的宗教化生活需要,这是由当时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其“崇神敬天”的社会生活和宗教化意识形态而共同导致的。

另外,虎纹多与人的形象组合在一起,比如商中期的龙虎尊,两虎共首,口下有一裸人;司母戊大方鼎的双耳上装饰着两虎相对,口中有一人头;虎食人卣表现人与虎紧拥在一起。这些人兽主题中,人的表情都很平和,而不是恐惧,显然这是一种宗教意味,这里的人可能象征具有权力的巫或王。有学者以为,这些巫或者王们掌握着通天地的法术,借能够通神灵的动物来与上天沟通。除了面目狰狞的兽面纹之外,商代的青铜器上也常常用鸟纹作装饰,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鸟是他们的祖先,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sup>[4]</sup>,因而,他们将鸟作为图腾加以崇拜。

对此,笔者以为,这些纹饰一方面表现了商周时期人们的自然认识水平低下,对天和自然界的现象因无法正确认识而产生的敬畏恐惧的情感;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时人们渴望认识大自然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强烈愿望!

## 二、西周中晚期

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在这个时期,井田制、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等社会生活制度纷纷建立,也带给西周社会一些新特点。这些都是当时社会对于“人”的观念树立的集中反映。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炊器类:鼎、鬲等;盛食器:簋、盂、豆、敦等;酒器:爵、角、壶等;水器:盘、鉴等;乐器:编钟、铃、鼓、铙等等。由于西周是我国礼制最为鼎盛的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的青铜礼器大都成套出土。其中食器、乐器的种类和数量很多,礼的作用明显增强。酒器的减少也是这时的突出特征。《尚书·酒诰》记载,周人鉴于商周统治阶层酗酒亡国,对饮酒设立了种种限制,以纠正社会风气。从考古发现来看西周的酒器确比商代少,商代常见的爵、尊、方彝等酒器,西周早期还多,中期后则越来越少。

西周初期,青铜器的纹饰基本上沿袭殷人的风貌,但很快就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气质。周人的青铜器,造型圆浑饱满、舒展,纹饰和谐、亲切,大块的空白显示出质朴、开朗的气息。在周穆王之后,这些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周代青铜器纹饰抛弃了殷人的饕餮纹、夔龙纹等恐怖、狰狞、神秘的形

象,而采用了重环纹、重鳞纹、蛟龙纹、回纹、波浪纹等意象活泼而和谐的纹饰。器皿的造型也放弃了威严、沉重,代之为舒展、豪放、雄浑、典雅。这是周人在充分吸收和消化了殷人艺术之后,根据自己的个性进行的创造。

这种原因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西周初期统治者看到“尊神”且“率民以事之”的殷人,也没有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深切感到“惟天命不与长”,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因此,在国家治理中,周虽“因于殷礼”,然“其损益可知也”。表明周人对殷礼的损益不仅仅是量的增减,而且是质的飞跃。他们“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sup>[5]</sup>。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民本主义思想,开启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人道主义思潮的先河。与之相对应的是西周,特别是西周中、晚期,动物性纹像开始走向简化、范式化,写实性的人物纹像开始出现。青铜器纹饰与造型的变化之所以是发生在西周,这与周礼的形成与推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西周早期晚期,特别是西周中期后,由于周礼颁行,商代那种奢华、狞厉的色彩逐渐隐退,理性的因素有所增长,人的地位得以提高。礼制的推广使青铜礼器及其纹像走向范式化,无论是人物或是动物纹像都趋向规范、统一,没有了前段的狞厉美,我想这应当是商周青铜器的一大区别,也应当是西周青铜器纹饰造型等比商朝末年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比商朝青铜器缺少了想象力丰富的各种纹饰方面的原因。

兽面纹的改变是对殷商鬼神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大冲击大破坏,彰显出殷周文化的不同质点。同时,随着原始宗教意识的淡化,意识知觉力的进步,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艺术的写实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 三、春秋战国时期

东周时代的青铜器,是在奴隶主贵族逐渐衰亡,新兴地主阶级开始正式走上历史舞台这一历史转变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阶级力量的对比,在青铜铸造业上也有着深刻的反映。商和西周时代铜器消费的主要对象是王室王臣,而此时各诸侯国则普遍铸造铜器。不仅晋、楚、齐、鲁、吴、越、秦等大诸侯国铸造青铜器,而且许多小诸侯国也有着自己的青铜铸造业,如,徐、江、黄、营、都、邓、蔡、许、陈、滕、薛、杞、祝、戴、苏、耽、虞等国的青铜器都有发现。<sup>[6]</sup>

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东周时代的青铜器在全国许多地方不断有重大发现。如1955年安徽寿县发现的蔡侯墓,出土遗物中有上百件青铜器,包括礼器、生活用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1954-1955年河南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春秋战国墓葬的发掘,出土铜质器物有容器、兵器、工具、服饰器等,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发掘的战国楚墓,出土铜质器物中最重要的是13件一套的编钟,另外还有礼器、生活用器、彩绘铜镜,以及削制竹简的铜工具等,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出土各类文物总数达10000余件,其中青铜礼器和用具约140件,铜兵器和铜车马器也很

多。该墓出土的铜制品中最著名的是总重量达到2567公斤的64件编钟<sup>[7]</sup>。

东周青铜器总的特点是,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涉及到多方面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青铜武器的发展自然相对较快,主要盛行戈、矛、戟、剑,以及戈、矛的附件蹲、铍等。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冶子等人。

战国中期以后,精美绝伦的青铜装饰大为衰落,器物大多日用化,出现了很多青铜镜,例如有世界上最早的光学聚焦镜,这在史书中也能找到记载,据《礼记·内则》记述:做儿媳的每天凌晨都要将“金燧”等日用工具佩戴在身上,到父母那里去问候安宁。这“金燧”就是用青铜制作的光学聚焦镜,古代又名“阳燧”,今日则叫“聚光镜”或“凹镜”。它的用途是向阳取火,让太阳光点燃艾条之类的“火煤”,用以烧火煮饭。

纹饰方面,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除铸纹外,出现了精细的鎏金纹和刻画纹。镶嵌、镂刻等装饰技法广泛运用,即使一些小国工艺水平也相当发达。如北方的中山国,湖北随县的曾国均出土制作精美的青铜器。镶嵌技术的运用使铜器获得优美华丽的艺术效果。

战国时期以社会生活的场面为主题的装饰成为主题,这在青铜装饰史上是重大的变化。以绘画形式运用镶嵌或镂刻技术的装饰图案包括宴饮、乐舞、狩猎、战争、采桑、酿酒等丰富多彩的生活场面。著名的“采桑宴乐水陆攻战纹壶”堪称此类装饰的代表。器身上自而下二个层次,每个层次又分参差两层,以独特的线刻和剪影的方式表现各种格斗、竞射、划船、采桑、犒赏等场景。

从东周青铜器纹饰所表现的内容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1. 人本主义得到加强。东周时期,社会进入了一个革新期。“礼崩乐坏”带来了周礼的衰落,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人本主义思想得以加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sup>[8]</sup>等无不说明“民”(也就是人)的地位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这表现在青铜纹饰与造型上就是在春秋早中期人物与动物性纹饰与造型承启西周末期之风格,而彻底否定了神秘、威严的气氛和呆板、范示化的作风而走向写实主义,人物和动物多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形象被搬上青铜器,这也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使人对自然更加了解的结果。此时的自然对人类而言不再神秘,已成为比较可知的现实,人的价值被重新定义,自然对人类的束缚得以解脱,人和自然的关系由消极

被动走向了积极主动。

2. 人与自然关系得以重新定位。春秋晚期后,社会的变化又决定了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对自然进行重新理解和认识,得出了“天道远,而人道迩”<sup>[9]</sup>的结论。青铜器纹饰与造型从物质层面表现出该阶段思想观念的变革,此时期人物画像纹盛行,在此类纹像中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成为图案主体,动物则成为被渔猎的对象和补空勾边之用。即使是怪兽也仅表现出其装饰性而不具备早段那种神秘和威严。在漫长的青铜时代历史进程中,春秋青铜器人物纹饰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意义,它是由“神”的艺术向“人”的艺术的重要的过渡。这正是荀子“人定胜天”所言的勇气,体现出人类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的决心、斗志和成果。

总之,商周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从青铜器的作用和纹饰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青铜器由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青铜礼器的作用,在商周奴隶制度盛世最为明显。但是到了春秋晚期,安徽寿县蔡侯墓使用了九鼎,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王墓也出土了九鼎。这是诸侯僭越天子之礼;“礼崩乐坏”,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和礼制的崩溃,兴盛一时的青铜礼器逐渐失去了它威吓人、约束人的功能和作用。

商、周青铜器的纹饰也由神秘走向写实,由单调走向多样,人物与动物性纹饰中的人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配角成为主角。这一切正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人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转变的最好例证,反映了人们从对自然的畏惧和无知到认识自然、认识自身的力量,并试图通过自身活动改变自然、控制自然的意识和能力的不断增强。

#### 【参考文献】

- [1]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2]张光直. 青铜器[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 [3]张光直. 中国青铜时代[M]. 上海:三联书店,1990.
- [4]诗经·商颂
- [5]国语·周语
- [6]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M]. 列国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7]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 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 [8]随县擂鼓墩1号墓考古发掘队[J].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 文物. 1979
- [9]国语·周语. 礼记·表記

[责任编辑 代名]